

柴王墓备览

——田园调查手记之十四·麻林村

□ 叶继程

在萌生这篇调查手记的想法之前,曾专门致电岑河文化站长李发国先生,仔细咨询柴王墓的确切方位与踏访路径。

毕竟这个柴王墓只是乡野流传的一个故事。为弄清楚这个传说的真相,亦马年惊蛰日,趁朋友调休,结伴去实地探访。

沿沙岑公路驱车向东,出沙市城区,视野便骤然开阔起来。江汉平原的坦荡与温润,在连片的水田、沟渠与村落间缓缓铺展,像一卷被时光轻轻摊开的乡土长卷。2012年3月,由岑河镇划入荆州开发区管辖的麻林村,就藏在这片寻常田园深处。若不是心中揣着一桩悬置多年的地名与传说,寻常路人绝不会留意,这片看似普通的乡野间,竟静卧着一座被唤作“柴王墓”的千年古墓。它东依谷湖村,南邻鼓湖渠。既无显赫的碑刻,也没有规整的墓园,只以一抔隆起的黄土,隐于田垄与屋舍之间,蛰伏静默,如同大地本身。菜花遍地金黄,渠侧杨柳依依。对我和同行的友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寻访,而是一场跨越文献、考古、口述与传说的田野备览——在正史语焉不详、地方志记录稀疏之处,为一座无名古墓,写下它专属的文字。

麻林村一带古称武陵港,境内姚家岭一带更是古墓葬密集之地。早年当地考古调查与民间发现中,曾在楚墓中出土青铜剑等文物,足见这片土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是先民聚居、兵戎往来的重要区域,历史积淀极为深厚。千百年来,这座墓在乡间不称官方名,不辨年代,不书姓氏,只一口咬定:柴王墓。再追问,又有人唤作五代梁王墓。两个名号,一段传奇,在口耳相传中交织缠绕,成了麻林村最古老、最坚定、也最神秘的文化底色。这座墓的真正价值,从来不在它究竟是不是柴王、是不是梁王,而在它如何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如何在正史与民间之间,撑起一段被忽略的历史。

民间的讲述朴素而真诚,不带考据,不加修饰,却自带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村里的老人说,当年有一位王爷,兵败南逃,一路颠沛,最终落脚在芦苇丛生的鼓湖西岸。在这片偏僻的水乡,他不扰民,不恃强,待人和善,深得百姓感念。后来伤重不治,临终前嘱咐乡人,秘葬于此,一抔黄土掩身。千古江山,英雄无觅;风云散尽,只余荒丘。不立碑,不事张扬,便有了这座无名无志的土冢。岁月流转,说法渐多:有人说他是后周柴王,有人说他是五代梁王,有人说他是兵败流落的宗室,有人说他是护民而死的将领。故事在一代代转述中外延不断丰满,渐渐生出许多灵异与祥瑞:夜半墓上青光浮动,说是英灵不散;大旱之年前往祭拜,常有甘霖应时而降;牛羊走到家前,会自动绕行,不敢践踏;孩童在附近嬉闹,长辈总会轻声叮嘱,勿要惊扰了长眠的王爷。这些近乎神话的叙述,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虚妄,可在乡土社会里,它是信仰,是敬畏,也是最原始、最坚韧的文物守护之道。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才发现,传说从不孤单,它与周遭的地名彼此印证,形成一套完整而自洽的乡土叙事。墓旁不远处,有梁王沟,有梁王台,有饮马池,一个个带着王侯气象的名字,像散落在田园间的注脚,默默指向那段被想象出来的金戈铁马。村民们愿意相信,这里曾是王爷驻兵之地,曾是战马饮水之所,曾是军旗飘扬之处。他们不需要考古报告,不需要文献佐证,只凭着世代相传的记忆,便认定这片土地与一位高贵而悲悯的灵魂紧紧相连。这种认定,无关学术真伪,却关乎情感归属;无关

历史定论,却关乎文化根脉。在麻林村,柴王墓不是一座冰冷的古墓葬,而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一种融入日常的乡愁。

然而,当我们从田野回到文献,从传说回到考古,一层温柔而清晰的面纱便缓缓揭开。这座乡间口耳相传的柴王墓、五代梁王墓,在文物部门的正式定名中,叫作江陵梁代墓。一字之差,相隔数百年。梁代,是南朝之梁,而非五代后梁;是南北朝时期的萧梁王朝,而非五代十国的朱氏后梁。这意味着,民间口中的五代风云,其实是南朝的风月;传说里的柴王与梁王,不过是后人在口耳相传中,将“梁代”误作“梁王”,将遥远的王朝故事,附会到一座无名古墓之上。这并非刻意虚构,也不是恶意编造,而是乡土历史记忆最自然的流变——普通人无法精确分辨朝代更迭,无法厘清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只能用自己最熟悉、最顺口、最能理解的方式,为一座古墓赋予身份与意义。

这一结论,并不会削弱柴王墓的价值,反而让它在历史坐标系中站稳了更真实、更珍贵的位置。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而璀璨的时期。北方长期分裂战乱,江南相对安定繁荣,荆州江陵则成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南朝西部的门户,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枢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座保存相对完整、封土形制清晰的南朝梁代墓葬,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它不是帝王陵,不是皇族冢,却代表了那个时代荆州地区中上阶层的丧葬制度、社会结构、生活习俗与审美取向。在荆州境内,南朝墓葬并不算数量稀少,但像岑河麻林村这样,历经千年未遭大规模盗扰,封土尚存,位置明确,且与民间文化深度绑定的梁代墓葬,依旧难得。

它的价值,首先在于填补区域历史的空白。魏晋南北朝历时数百年,政权更迭频繁,文献记载多集中于都城与军政大事,对于地方社会、基层人群、普通士族的记录少之又少。江陵梁代墓静静埋藏在麻林村的土地上,不声不响,却以实物形态,保留着南朝时期荆州水乡的生活信息。它的墓葬形制、朝向、规模,能够反映当时的丧葬礼仪;未若若经科学发掘,墓中的青砖、瓷器、器物、铭文,甚至棺木与遗骨,都能成为解读南朝社会经济、人口迁徙、手工业水平、信仰观念的直接证据。在文字缺席的地方,文物开口说话;在正史忽略的角落,古墓默默见证。它是荆州南朝史一段重要的留存,等待着更深层次的探索,等待被更细致地书写。

其次,它的价值体现在长江中游文化交流的实证意义。南朝时期,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向西辐射,与荆楚本土文化、甚至巴蜀文化不断交融;北方士族南迁,又带来中原传统礼制与技艺。荆州地处水陆要冲,是文化传播的关键节点。麻林村的这座梁代墓,虽非高等级大墓,却恰好处于民间与士族之间的中间层次,最能反映普遍的社会文化面貌。它不像帝王陵那样极尽奢华,也不像平民墓那样简陋潦草,恰恰能呈现一个时代最真实、最普遍的文化底色。从墓砖的纹饰,到器物的风格,再到墓葬选址与风水观念,都能看见南北文化、江汉本土与江南主流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南朝文化版图上一枚微小却清晰的印记。

更重要的是,这座墓拥有极为难得的完整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它躲过了战火,躲过了大规模平整土地,躲过了猖獗的盗掘,至今仍以原始封土的形态静卧田园。

在当今文保视野下,未发掘、未扰动、未破坏,本身就是一件极高的价值。它像一封被千年时光密封的信件,保持着下葬之初的状态,保留着最完整的历史信息。这种完整性,使它成为研究江汉平原南朝墓葬的典型标本,也为未来的考古工作保留了最珍贵的现场。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古墓葬,因盗扰与破坏,只剩下空壳与传说,而麻林村的柴王墓,却在民间敬畏与岁月庇护下,守住了最核心的历史价值。

然而,若仅仅从考古与学术角度解读柴王墓,终究是单薄的。它最动人、最独特、最不可替代的价值,仍在于民间记忆与乡土文化。在麻林村,“柴王墓”这三个字,早已超越了它的真实年代与身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集体情感,一种地方认同。村民们世代代守护它,不是因为它是南朝梁代墓,而是因为它是他们心中的柴王,是护佑一方的英灵,是故乡的一部分。这种守护,没有文保法规的强制,没有利益的驱动,只源于对土地的敬畏,对先人的感念,对故乡历史的自尊与自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正是这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让一座无碑无铭的古墓,得以安然存续。

大隐于野的墓,不见陵阙,我仁心良久,沉吟无语。封土不高,直径三十余米,野草在上面枯了又荣,风从麦田吹来,带着春天泥土的芳香。四周是安逸的乡村景致:农人荷锄而过,孩童追逐嬉闹,狗在墙角边慵懒地躺着,沟渠里的水缓缓流淌。千年的时光,在这里仿佛被拉得缓慢而柔软。地下是南朝的魂魄,地上是当代的尘世;一边是考古学上的梁代墓,一边是民间口中的柴王墓;一边是严谨的历史真实,一边是浪漫的乡土想象。它们彼此并行,互不冲突,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这座古墓完整生命。所谓“备览”,并非要纠正传说,否定民间,也不是要以考古权威压倒乡土情感。真正的备览,是承认历史的多元性,是看见文字之外的记忆,是理解真实之上的温情。柴王墓的意义,正在于它同时拥有两条生命:一条属于考古,属于南朝,属于严谨的历史科学;一条属于民间,属于传说,属于长盛不衰的乡土文化。少了任何一条,它都不再完整。

在荆州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名家巨冢、王陵帝冢并不少见。纪南故城的壮阔,八岭山的幽深,湘妃墓的传奇,万寿宝塔的庄严,每一处都足以震撼人心。相比之下,麻林村这座不起眼的土冢,显得格外朴素,甚至卑微。可它并不因此失去光芒。恰恰相反,它以最谦卑的姿态,告诉我们:历史不只存在于煌煌典籍与宏伟遗迹中,更存在于乡野间的一抔黄土、一段传说、一句口传、一份坚守里。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那些被时间冲淡的小事件,那些被学术遗忘的小墓葬,共同组成了更广阔、更真实、更温暖的历史。

夕阳西下,蛙声四起,我们辞别麻林村。垄上油菜花盛开,田野铺满一层柔和的金色,几树紫玉兰把村庄映衬得静谧祥和。柴王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最终与大地融为一体。

这篇田园调查手记,我只愿如实记录:在南港与鼓湖交汇的田间,在麻林村袅袅炊烟中,有一座古墓,曾见证南朝风月,亦承载五代传说,它是历史的遗珍,亦是乡愁的归宿。

古墓沉烟,岁月留痕,“寄言尘世客,何处欲归临?”麻林阡陌间,一抔黄土,便载尽山海风月与人间乡愁。

活化楚辞大家谈

鱼——千年楚菜的绝对主角儿

□ 张卫平

2500年前,章华台。楚昭王大安群臣,边观赏着细腰美女的舞姿,边非常高兴地举着箸,伸向铜甗中那热气腾腾的清蒸青鱼。此时,这位以“迁都于郢”闻名的君主或许不曾想到,他品尝鱼鲜的场景,化作了楚地千年不衰的饮食传统与吉祥密码。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仅仅只用四个字,就勾勒出古代荆楚的生活图景。《宋史》里,更是说江汉地区所产的“鱼鳖、鼈、鼉”是天下最多的。清光绪《荆州府志》的“物产”条目中,专门列有“鱖之属”。历史文献中“荆那多鱼利,而鲫鱼更多,产湖泽中”的记载,更是勾勒出了一幅古代荆州水产丰饶的图景。这种丰饶,在历史故事中有鲜活的体现。孔子游楚时,有楚人要要把鱼送给他,孔子执意不要,那人却说,“天寒岁远,鱼不能售,思欲弃之,不如献之君子”。可见,楚国的鱼太多。楚国此等的富足,令西汉史学家刘向感叹不已,便在《说苑·贵德》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个故事。

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楚人的餐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材,历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解楚人食鱼习俗的窗口。作为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荆州博物馆考古人员从楚墓中出土了众多“鱼”文物,如1975年,以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三鱼纹漆耳杯,在耳杯的内底正中,绘有四叶纹,三条首尾相接的鲤鱼环游其外。如果在杯中注入白酒,便犹如鱼得水,非常的有趣。无独有偶。1986年,又以江陵毛家园一号汉墓出土一件彩绘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用金、红、蓝色绘成三条游鱼。1992年,再次从荆州高台28号汉墓出土了彩绘鱼纹漆耳杯,内底彩绘了一条鱼,鱼的轮廓用黑线勾勒,头、鳞与尾用金色填绘。

除了漆器上绘有的鱼纹外,在荆州的楚汉墓葬中还出土了鲫鱼、鲤鱼、鳊鱼等十几种鱼的骨头。甚至,还发现了用骨腊过的鳊鱼、风干的阳干鱼、栩栩如生的木头鱼,与出土楚汉竹筒中“干煎鱼”记载,和屈原在《楚辞》里所列楚王宴菜谱里的“煎鲫鱼”一起,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楚地鱼类资源非常丰富,荆州人民食“鱼”习俗与传统非常悠久。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时光隧道里穿越2000多年而来的13根阳干鱼,还静静地躺在文保中心实验室里,而湖北省博物馆里的那条荆州夏家台阳干鲫鱼,已经成为了网红。与夏家台楚墓遥相呼应的,则是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灯煎鱼”,盘中的煎鱼同样历经了2000年,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烹饪时的姿态。这些实物,无声诉说着楚人与鱼的不解之缘。在《韩非子》里,还记载了令尹孙叔敖常食“枯鱼之膳”。这种将鱼晒干的保存方法,既适应了楚地炎热气候,也体现了鱼在饮食中的基础地位。总之,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出这片土地鱼类资源的丰沛。仅《楚辞》收录的荆州经典名菜与地方特色菜中,鱼有便有20多道,豆瓣鲫鱼、清蒸青鱼、红烧鲫鱼等,各具特色,极具荆楚特色。自然的馈赠,滋养了楚地独特的烹饪智慧。仅鱼鲜的烹调方法,至少也有30多种。加工的形式,更是多样,如鱼饼、鱼圆、鱼面、鱼糕等,充分体现了“吃鱼不见鱼”的烹饪智慧。

“物换星移踪迹在,沙沉石化影班班。”诗友邓焰如的一首《龙王井村鱼化石》,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更加久远的时光。从松滋出土的中华金龙鱼化石,到荆楚大地与鱼类的渊源前推到5500万年前。而荆州博物馆里收藏的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文化出土的抱鱼陶人以及陶龟,与屈原、李白、苏东坡诗词里的“鱼”,以及楚汉墓葬里的各色“鱼”文物,相映成趣,形成一条从远古延伸至今的食鱼文化链。

俗话说,宴无鱼不盛,席有鱼方吉。宋代范成大的《荆渚漫笔》的“鱼虾蒲羹具罗案”,正道出楚地宴席之丰。如今,在荆州,婚嫁席上必有鲫鱼,因“鲫”与“吉”音近,又被称之为“喜头鱼”,寓意婚姻美满,相随相靠。而“油煎鲫鱼”,则祈愿多子多福。在团年饭中,必有一道全鱼。旧时,这条全鱼大多不吃,而一直留到元宵节,取“年年有余”之吉。这种传统,可追溯到楚人祭祀用鱼的礼俗。《国语》里说,“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鱼在楚文化中早已超越了食物范畴,成为连接世俗与神圣的媒介。

在荆楚文化中,鱼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食物范畴,成为承载多重寓意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鱼有在荆州饮食的传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烹饪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从章华台楚王的宴席,到今日荆州人家的团圆饭;从楚汉漆器上的鱼纹,到婚嫁桌上的豆瓣鲫鱼,“无鱼不成席”的传统如江汉之水绵延不绝。如今,人们品尝鱼鲜时,唇齿间流淌的不仅是鱼鲜之美,更是穿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与饮食习俗。这条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仍在每个楚地宴席上静静流淌。

“食色,性也。”正如孟子所言,“鱼我所欲也”。鱼鲜的美味,让楚人欲罢不能,食鱼的习俗一代一代在楚地流传了下来,成为荆州人饮食习惯与中华年节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新亮点,将“无鱼不成席”之俗演绎的淋漓尽致。总之,一条鱼穿越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最终抵达人们的餐桌上。荆州宴席上闪烁的鱼鳞,不仅是楚水的光泽,更是楚人饮食智慧的结晶。

简说楚文化①

简说楚文化·序

□ 刘玉莹



出不穷。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楚文化著作,人们发现了一种现象或曰缺憾,即要过于于烦琐,要么过于简略,为此,我们博采众长、精心剪裁,编撰了这本《简说楚文化》,并配以精美文物图片,力求图文并茂,虽不敢以踵事增华自诩,却可以补偏救弊视之。

《简说楚文化》由两个关键词组成,即“简说”和“楚文化”。所谓“简说”,并非指一味求简,而是指以简驭繁,辞约义丰;所谓“楚文化”,大致取学界较为通行的文化“三层面”说,即依照器物层面(或曰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理念层面(或曰精神层面)展开,考虑到楚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器物层面聚焦于科学技术,

将理念(亦作观念)层面分解为哲思艺文和信仰习俗。有鉴于解读楚文化离不开对楚国历史背景的把握,且楚楚文化的精神和追寻楚文化的脉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特意设置了与上述内容相关的章节,以期呈献给读者一部内容全面系统、文字简洁明快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楚文化读本。通过这本书,广大读者既可以认识楚国跌宕多姿的悠久历史和和而不同的典章制度,又可以领略其领先标新的科学技术和惊采绝艳的哲思艺文,还可以感知其色彩斑斓的信仰习俗和卓尔不凡的精神特质,进而寻绎其润泽千秋的悠远文脉,若所期如愿,则幸甚幸甚!

开栏语

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州。是楚文化的根脉之地、发祥之城,为赓续千年文脉,讲好楚都故事,《荆州日报·文化荆州》今起推出《简说楚文化》专栏。以通俗之笔、简明之语,解读楚风楚俗、楚物楚韵,梳理楚史楚典、楚魂楚脉,让厚重楚文化变得可亲可感、可读可传。

一简知楚,一文见心。愿以专栏为桥,连接古今;以文化为灯,照亮传承之路,让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成为荆州最鲜明的文化标识与精神力量。

楚文化特殊的地位和无穷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世人关注的目光和学者探索的步伐,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和介绍楚文化的著述层

文化荆州

二〇二六年第十三期 总第二百零四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